

論中共與蘇俄關係的未來趨勢

* 梅 谷

最近美國政府內外的專家們認為，中（共）蘇之間不可能停止衝突。正如一位時常接受訪問的學者所說，中（共）蘇友好的機會等於零。自從一九七六年以來，有些人認為毛澤東主義將繼續存在，他們所預測的集體領導將可以確保平穩的權力交替，可是中國大陸在毛死亡的權力鬥爭證明這些預測與事實相反，因此，美國的一些所謂權威之士變得很謹慎。有些人走向另外一個極端，認為可以接受和北平外交關係正常化的條件——放棄臺灣，防止北平親向蘇俄（我將稍後討論此一問題。）一般的看法是，在北平和莫斯科的關係之間，國與國之間的關係將有改善，但是親密的政治聯盟實是不能預見。這是一項似乎可信的假設，即使在美國以外的學者們亦同意。不過，將來の中（共）蘇關係對於東亞和全世界的和平與安全有相當重大的影響，兩者之間的共同內政和外交政策目標是否會引導兩股重要的共產勢力重新和好，是值得注意的課題。

在毛死後的期間，中（共）蘇重修舊好的可能性如何？從一九七六年十月以來，中共政權很明顯的改變其政策路線。過去所發生的一切只能用「非毛化」來形容。幾乎所有在文革期間遭到整肅的老幹部，只要他們還活着，都重新復出；新的國內政策，事實上是和毛澤東所強調的和試圖去建立的，有一百八十度的改變。非毛化的政策比非史大林化更為重要，後者只不過是有關手段而已，而非牽涉到政策的本身。非史大林化是對史大林的個人攻擊，恐怖政策的和緩並未改變計劃經濟的一般策略；黨和政府的地位亦沒有結構性的改變，其結果只是將史大林的遺體從列寧的陵墓移出，和降低他在蘇俄名人錄上的個人地位。相反地，非毛化所表示的是，放棄毛澤東所主張的立即共產主義和不斷革命論，從新回到分期的計劃經濟、等級教育和重新組織的政黨政治，並且不穩定地抓着毛澤東所代表的祕思——他是永遠不倒的舵手和教師。

保持毛澤東在中國大陸的不減影像之理由是明而易見的，中共政權沒有像列寧的政治人物可以託附；毛的權威可以用來製造模糊的認可，承認非法的繼承。更進一步而言，中共政權使用巧妙的政治技巧，把重新解釋的毛澤東從毛澤東政策分出來，它的方法是譴責「四人幫」曲解毛澤東的本意，並指他們為目前屢受指責的毛澤東政策的真正制定者。當「四人幫」已成爲理想的代罪羔羊之時，毛澤東躺在比列寧大六倍的水晶石棺裏，永遠沉息，而他的話又能被新的領導者作選擇性的引用。這些人一再強調，把毛澤東的所有的話視爲同等重要，隨時引用，不做選擇，是錯誤的和迷惑羣衆。目前在中國大陸，吾人可以見到毛澤東政策的終止，但是毛澤東的人格化依然存在，雖然，有一天它可能亦會消失。毛澤東所強調的二條路線的鬥爭，已經結束。無產階級路線所強調立

即共產主義和不斷革命，已被捨棄，代之而起的是資本主義本質所強調的正常共產主義路線的分期計劃經濟。這是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的路線，是近乎蘇俄共產主義的路線，是一種修正主義，假若有人引用這句話來形容目前的政策路線，它同時也是一九五七年之前政策的大後退。對於科學、西方技術、考試、計劃、生產和獎勵的重視；專家管理代替革委會管理；政黨的重新組織；軍隊的專業化；重新回到一九五〇年代的各項計劃方案，特別是制定共產主義法典的要求，都表示目前的一切回復到馬克思和列寧主義——此項實是中國共產黨的來源，亦是當今政策的藍圖。

即使在毛澤東主義之下，馬列主義的基本觀念一直是毛澤東發展他自己烏托邦異端學說的架構。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自我調解的集體意志以取代國家，世界革命和民族解放戰爭的策略是馬列主義亦是毛式共產主義的基本論點。中共和蘇聯一直引用馬列主義所主張的國際關係的二種並列的理論，劃分友好國家間和正式官方的關係；以及政黨、革命組織和運動，支持彼等推翻他們個別的政府。在目前，毛澤東的狂言已受限制，隨着共產主義所具有的共同本質，北平政權的修正立場和正規的共產主義國內政策，中共和蘇俄已無不同。依照邏輯推動，他們應該重修舊好。然而，歷史並非時常合乎邏輯的。

從有關中（共）蘇雙方領導人物的言論和行動的現有資料，我們發現兩方面都有人主張和好。在毛死亡以及北平政變之後，中（共）蘇之間的互相謾罵，在前個月，各有收斂，以後又恢復往日的尖刻。北平從不喪失每一個機會來討好莫斯科的敵人，並且試圖向他們強調蘇俄侵略的危險程度。這種外交做法使得中共稱讚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美日安保條約和警告美國任何有關於防範蘇俄的鬆懈做法。蘇俄亦以同樣的尖刻語調，指責中共破壞國際社會主義和向帝國主義屈服。中共和蘇俄之間的宣傳衝突，已成為全球性，並且與日俱增。

在另外一方面，我們可以發現一些有趣的跡象和雙方的接觸，這些可以被視為是趨向最後階段或驟然改變的表示。自從一九七五年十二月鄧小平釋放蘇俄的直昇機以及飛行員，違反了中共政權對於此一事件的原先說法，外界對於中共的真正意圖很不明白。不僅如此，中（共）蘇之間也有官方的接觸，例如在北平時開時閉的談判，和最近由中共大使在莫斯科進行的談判。非官方的接觸亦發生於東京、華盛頓和其他首都裏的中共和蘇俄大使之間。此外，北平和莫斯科簽訂了黑龍江的航行協定。在宣傳方面，十六部蘇俄電影曾在北平和其他城市放映。更令人可疑的是雙方對一九五〇年的同盟條約含糊其詞，雖然該條約已被認為失去意義，但是雙方却無意表示放棄。接着，有某些知名的訪問者，先到莫斯科，然後轉往北平。最有名的應該是南斯拉夫的狄托，它的修正主義似乎是已被中共新的領導階層遺忘，他的訪問增進了中共和南斯拉夫的關係，引發了中共對於該國經濟制度的興趣，並使中共和該國共黨之間的關係重歸舊好。這種彈性的外交使我們懷疑是否中共和蘇俄之間有不可彌補的裂痕，或兩者不可能在世界共產策略上進行合作。再者，我們禁不住要問，中（共）南之間的友好態勢是爲了增進南斯拉夫的獨立？或者是中共和蘇俄之間的間接接觸？當越共領袖黎筭訪問北平，他和華國鋒的演講談到中共和蘇俄的共產主義世界觀，但是雙方都沒有對任何問題提出反對意見。這到

底是中(共)蘇不能妥協的表示？還是雙方意識形態談判的開始？被稱爲中(共)蘇「代理戰爭」的越南和高棉之間的戰爭，是否正成爲中(共)蘇權力鬥爭最重要的問題，且因雙方曾經試圖解決而遭失敗？或者越南和高棉的戰爭是否是比較次要的問題，可以等待其他較重要的問題處理完畢之後，再行商議？

我們現在要注意的是，在中(共)蘇修好成爲可能之前，什麼是必須解決的問題。最主要的阻礙——毛本人已不存在。中共目前仍然引用毛澤東的語錄，用來鞏固權威和防止任何倉促政策改變帶來的破壞，這些言論，雖然不合莫斯科的口味，它却可以暫時忍受，只要中共對毛語錄只施口惠而無真意，而蘇俄也考慮較高層次的共產主義的全球性利益。然而必須注意的是，在中(共)蘇關係的每一方面，毛澤東主義依然存在。這從中共的宣傳口號和政策方針，我們可以看出，一、二。雖然有人認爲中(共)蘇修好可以讓中共領導階級脫掉遮蔽物——毛澤東的影響，但是他們好像沒有準備這樣做。

以上所言引起第二個重要問題：目前中共領導人物對毛澤東的尊敬態度。依作者的看法，目前的政治妥協所形成的領導中心是不穩的。一般來說，最高的領導階層中有二派。第一派是歸鄧小平領導，和周恩來有着密切關係，是長征之後生存的老幹部，他們在文革期中遭到整肅。目前鄧小平被認爲是受到多數政府官員、黨的老幹部和軍司令員的擁戴。我們通常把這些人認爲是正規的共產主義者。在另外一方面，我們可以見到一批經由文革起家的人物，特別是華國鋒和汪東興，這批人承認了中國大陸內部的權力轉移和對毛澤東主義的反抗，適時見風轉舵。但是，華國鋒和他的黨羽很難捨棄他們主子的政策的最後一部份——反對蘇俄。他們要比鄧小平這一派更難和蘇俄修好。

葉劍英算是中間人士，促成黨派間的妥協，和維持他們之間的平衡。但是八十高齡的葉劍英據說健康很差，因而影響到政治妥協的將來。雖然在一九七八年三月的全國人代會中，華國鋒取得黨主席、總理和三軍統帥的地位，實際上，由於鄧派人士接二連三地控制了軍政部門，華的力量大爲減弱。現在華國鋒可以說是被一批擁鄧的人士所包圍，華雖然有頭銜，鄧却是最有權力的人物。鄧小平是否利用他的親信，安插各地，以待時機再行反華，目前無法得知。或許，這一切是解決政治危機的最後辦法，即是華國鋒繼續建立黨政的元首地位之影像，鄧小平掌有實際的政治和行政權力。

在目前的政治不穩和僵局尚未解決之前，我們懷疑會有那位中共領導人物膽敢修正外交政策，而不引起內政動亂。更進一步的反毛將會使得華、汪和其他人士的地位動搖。更有甚者，目前被指爲「四人幫」的作法和惡行，華、汪和其他人都曾介入，這些又如何解釋？任何外交上的重大決策勢必要等到目前的政治安排已經穩定，或者等到權力的改變製造新的權威，有了新人贏得了目前的政治拔河賽之後。

就現階段而言，由於北平不能冒險挑起公開的政治鬥爭，減弱它對抗蘇俄的地位，或者誘使蘇俄干預，所以幕後的權力鬥爭變得更複雜。政治穩定是中共所必須克服的基本問題，而後方有餘力應付蘇俄。

姑且不論北平政權將追隨毛澤東政策多久，任何中共的領導人都不認為與莫斯科談判是件簡單的工作。中共在毛澤東與周恩來領導下，雖曾運用巧妙的外交手法，利用中（共）蘇衝突，從美國得到利益，但中共會發現和蘇俄談判是另外一回事。面對此一對手，中共有許多不利之處：經濟和軍事落後，以及毛澤東給予新領導階層的影響；而蘇俄在軍事、經濟上佔上風，並且認為實力是最重要的，隨時準備以此作為政策工具。在和蘇俄進行談判之前，中共必須增強自己的實力。基於此，中共所強調的政策目標，即是在一九八〇年成為社會主義的大國，可以認為是它本身的目標之一，亦是準備和蘇俄談判的必要準備。中共內政的改變，接受西方的科學技術和援助以發展經濟，也是必要的做法。其主要目的在平衡莫斯科和北平之間的關係：衝突之時中共較有力量保護自己，談判之時亦可以用來達成任何新的合作協定。同樣的，北平要求西方採取堅強的立場對付蘇俄，支持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批評美國對於限武談判的政策，離間日本和蘇俄的關係，這些都可以視為是為蘇俄製造難題，為中共爭取時間，壯大自己。

在第三世界，北平和莫斯科之間執行政策能力的差距，表現得很清楚。基本上，北平和莫斯科支持民族解放的戰爭。二者都利用兩面政策，為自己的好處着想：維持國家與國家間的正式和友好關係，支持游擊組織推翻他們個別的政府。在殖民地地區，有些國家從殖民地地位成為獨立國家，從少數白人政府演變成普選的政府，這種情形為北平和莫斯科製造良機，使他們可以支持游擊團體以種族正義和公平之名進行奪權。但是，中共和蘇俄在作法上和格調上有不同之處：莫斯科比較主動和積極推動擴張政策而北平則是採取間接和有限的行動。越南正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自始以來，北平和莫斯科支持河內攻擊南越，但是俄援的質和量遠勝過中共的援助。蘇俄認為，越南人民羣起反對一個為帝國主義所支持、不得民心的政府，最後的勝利必須是以軍事方式，配合俄式裝備和人員，以北越軍隊進攻南越而達成。這種以軍事方法得到最後勝利的見解，同樣在安哥拉和非洲其他地區，由蘇俄的代理人——古巴予以實施。最近發生在阿富汗的政變，亦是由一批經由蘇俄訓練、裝備，而且可能是接受蘇俄指揮的阿富汗部隊，配合當地共黨推動。事後有計劃地殘殺大批接受西方教育的阿富汗領導份子，足以表示共產革命的本質。

除韓戰時期的人海戰術之外，中共目前無法在援助方面與蘇俄相抗衡，它着重於訓練少數革命份子，給予有限的軍事和經濟支援，並且配合革命口號的宣傳，鼓吹鬥爭。毛澤東所說的「國家要獨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這是歷史不可抗拒的潮流」仍然被視為忠實的信條。基本上，中共和蘇俄對於追求共產主義革命的擴張，沒有差別，雖然方法會有不同，或者雙方互相指責對方改變策略，放棄目標。從北平所發出的各種宣傳，我們發現，黑魯雪夫的和平共存政策被認為是出賣了世界革命，蘇俄支援國際共黨的擴張活動亦被指為社會帝國主義，這一句話也已成爲北平描述蘇俄外交政策的主要詞句。由於這些歧見，二者之間的鬥爭在所難免，在毛澤東有生之年，這項鬥爭表現於全球性的社會主義革命，其中中共擅用它所特有的意識形態論點，而蘇俄在許多共產國家，以及支援東南亞、非洲和近東的游擊戰爭中，爭得優勢。

雖然中共和蘇俄爭奪共產革命的領導權，他們所追求的目標是相同的——在世界各地建立馬克斯政權。當它所支持的馬克斯政

權失勢之時，北平才轉向西方世界，特別是美國，採取與他們「平行的政策」，這種作法可以說是戰略的充分應用。同理，中共亦可能採取和莫斯科「平行的政策」，只要有利可圖。

羅德西亞是最好的實例。在該地，游擊隊的領袖們反對內部解決方案，喜好武力奪取政權的方式，和絕對統治，不願意接受民主的方式，因為他們不可能贏得選票，而且民主方式也和他們的主張不同。這些游擊領袖互有敵意，各起派別。他們雖然知道團結對他們的革命有利，却無法消弭歧見。馬加貝領導辛巴勃威民族同盟，並獲蘇俄支持；恩柯姆並認為是北平的同路人，他領導辛巴勃威人民同盟。他們不同的組織和基地反映出二人之間的競爭，也顯示出北平和莫斯科的鬥爭。在將來，二派是否將為共同的目標而團結一致是值得注意的問題。就像在越南一樣，北平和莫斯科終將採取平行的政策。假若，經過共同的努力之後，中共 and 蘇俄的競爭能減低到最低限度，在羅德西亞和其他地方，甚至於是一般的共產主義政策的追求方面，存在二者間的界線可以輕易抹掉。

即使是中（共）蘇之間有不同的政策，如果能互相配合，對於共產世界可能相當有利。一九六五年九月五日，羅瑞卿曾經為中（共）蘇衝突有所辯護：

在過去幾年內，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辯論有着歷史性的重要性。它使得馬列主義能空前地擴展，並經由每一國家的人民革命的真實實行，馬列主義真理的統一能夠大為增進。

基於此，羅瑞卿支持中（共）蘇合作。雖然在文革期間，羅瑞卿首遭整肅，他最近重新出現於中共政壇，職掌人民解放軍的治部。在第三世界，中共和蘇俄可能將他們的競爭轉變成為互相合作，支持彼此不同的革命策略，各取好處。

除了在第三世界的競爭之外，中共和蘇俄之間尚存有意識形態的差別，主要是由於毛澤東對於革命策略不同的主張。鑒於中共企圖將蘇俄逐出社會主義陣營領導地位的失敗，毛澤東改變策略，不再將世界局勢視為二個部份，一為共產陣營，一為資本陣營，中間有一中間地帶，而提出所謂三個世界理論，一為超級強國，彼此競爭，互相衝突；二個次級的資本主義國家，本身遭受超級強國的迫害；三為發展中的國家，也是拓展社會主義革命的主要地區。基於這個論點，中共是發展中的國家，也是社會主義的國家，將引導其他國家進入新型的社會主義。毛澤東和周恩來強調這個論點，當今中共政權的實力人物——鄧小平亦持此論調。在一九七四年四月對聯合國的講話中，鄧小平將中共的政策闡述得相當清楚。假若中共和蘇俄願意再結盟，社會主義陣營對抗三個世界是一個意識形態的問題，雙方必須調整官方的立場。可以想像的是，經由修好，一個最苦惱的共產世界領導問題或許可以獲得答案，也即是「在共產世界之中，誰將擔當騎師？誰將扮演馬的角色？」。在社會主義「國協」裏，假若讓中共扮演較重要的角色，有關共產世界的領導問題可能有變通的方法。

假若在最近或更遠的將來，北平決定再投向莫斯科，美國難能有所作為。為了達成所謂外交關係正常化，北平和華盛頓互換外交代表，北平要求美國從臺灣撤軍，和中華民國斷交，撤銷中美共同防禦條約。有人認為，中共相信美國終會接受這些條件，所以

它拖延了親善莫斯科的計劃，因為中共不願意激怒美國，而使它改變政策。這個推論似乎是合乎邏輯的，不過，一旦美國接受了這些條件，中共決定投向蘇俄，美國手中已經一無所有，可以讓北平改變這項政策。相反地，假設美國從臺灣撤退，再度減弱它在東亞的地位，引誘北平投向蘇俄的力量將更強烈。蘇俄支持北平攻打已經遭受美國遺棄的臺灣，很可能成為雙方結盟和重新合作的一部份。從美國的立場來看，接受中共的條件只能損害美國的信用，證實北平的說法——美國是紙老虎，增加中共和蘇俄修好的可能性。唯有固守美國在臺灣海峽的力量，保持和臺灣的密切關係，方能防止中共的冒險行動。這個原則遠比我們妄想和北平建立關係，更能有效地應付中共所挑起的冒險行動。

歐洲共同體怎樣向聯邦目標邁進？

陳元

前言

法國、西德、義大利、荷蘭、比利時和盧森堡等六國在一九五二年組織歐洲煤鋼共同體；又在一九五八年組織歐洲經濟共同體和歐洲原子能共同體。經過一九六五年四月的合併條約，建立歐洲共同體（European Communities），由一個部長理事會和一個執行委員會來執行三個共同體的條約。因為三個共同體之中，以經濟共同體最為重要，常被稱為「歐洲經濟共同體」。又因為「建立歐洲共同體條約」的第二條中有「建立共同市場」詞句，又常被稱為「歐洲共同市場」。一九七三年一月一日英國、愛爾蘭和丹麥正式參加，成員增為九國。

近代稱雄世界的西歐，在二十世紀前半，經過兩次大戰以後，各國都淪為第二流國家。東陲受蘇聯軍事力量的壓迫，隔大西洋又不得不聽命於美國的領導。第二次大戰使西歐人士有重振雄風的意識。法國總理白里安所提出的煤鋼共同體，只是走向統合的第一步，其範圍雖僅限於煤和鋼的聯營，但具有超國家主權的性質。到一九五七年三月二十五日簽訂經濟共同體和原子能共同體兩條約，就更擴大了「超國家」（Supranational）的範圍。雖然重要決定大都需要部長理事會（成員國代表）的全體通過，但是，所決定事項對所有成員國也都有拘束力。